

The Social Thoughts in May 4th Movement and the Literary Studies

“五四”社会思潮与文学研究会

潘正文 著

图书馆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I209.6
33

“五四”社会思潮与文学研究会

潘正文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四”社会思潮与文学研究会 / 潘正文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5133-0072-8
Ⅰ.①五… Ⅱ.①潘… Ⅲ.①五四运动(1919)—影响—文学研究会—研究
Ⅳ.①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6465 号

“五四”社会思潮与文学研究会
潘正文 著

责任编辑：李梓若
责任印制：韦 舰
封面设计：邓 聪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8831089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印 刷：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00×1000 1/16
印 张：18.25
字 数：228 千
版 次：2011 年 1 月第一版 2011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0072-8
定 价：30.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前 言

本论著是关于文学研究会的专题性研究，重点在于探讨“五四”时期的“互助主义”、“人类主义”、“泛劳动主义”等社会思潮对于文学研究会所造成的复杂影响。因为主题定于此，并且已有他人全面介绍文学研究会的论著出版在前，因此，本论著就不对文学研究会作全面的介绍。

本论著对于文学研究会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它在“为人生”文学时期的理论倡导和“爱”与“美”的文学创作，对于它在“五卅”之后转向了阶级文学的倡导及创作，不作过多论述。

“五四”社会思潮是一个相当庞杂的整体，各种社会思潮之间，呈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它的各种社会理想，都在“工读互助运动”与“新村运动”中有所体现，它们对于文学研究会的影响是综合性的，但为了把握的方便和条理的清晰，本论著还是作了区分性的论述。

“五四”社会思潮与文学思潮常常是相互融合在一起的，当时流行的“互助主义”、“人类主义”、“泛劳动主义”等社会思潮，与人道主义、个性主义文学思潮，以及现实主义乃至当时流行的“新浪漫

主义”文学思潮之间，呈一种复杂的胶着关系，这在本论著的论述中，均有所体现，但介于从文学思潮角度探讨文学研究会的论文、论著较多，现有成果比较充分，因此，本文就把侧重点放在了当时流行的社会思潮对于文学研究会的影响上。

文学研究会是一个会员多达170多人的庞大社团，如果要对每位发表过理论文章和创作作品的成员都进行论述，势必篇目庞杂，因此，本论著的探讨，主要集中于文学研究会的骨干与核心成员，因为他们是影响文学研究会主流色彩的根本性力量。所以，本论著采取了抓主干的处理方法。挂一漏万，在所难免，这既是本论著的困惑，也是现代文学社团研究所普遍遇到的难题。

因为想尽量还原文学研究会的背景性历史语境对于这个社团的复杂影响，所以，本论著把研究视野向前延伸到了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前的较长时期，以求考析清楚对于文学研究会的理论倡导和创作构成了方方面面影响的“五四”社会思潮的源流，从而便于对文学研究会文学的思想底蕴的把握，于是，不得不对“五四”期间流行于国内的各种社会思潮作了相当篇幅的论述。累赘之处，唯请方家多多见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录

1 前言

1 绪论

20 第一章 “五四”社会思潮激荡下的新村运动、工读互助运动与文学研究会的结社

23 第一节 “五四”社会思潮之汇流：新村运动

30 第二节 “五四”社会思潮之结晶：工读互助运动

35 第三节 新村运动、工读互助运动与文学研究会的结社

40 第四节 新村运动、工读互助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纯文学社团出现的精神关联

45 第五节 工读互助运动和新村运动为文学研究会留下的巨大思想资源

54 **第二章 “泛劳动主义”的文学者身份定位与文学研究会的著作工会姿态**

56 第一节 “泛劳动主义”的文学者身份定位与文学研究会成立“著作工会”的理据

60 第二节 “泛劳动主义”、“著作工会”与文学研究会“宽中带严”的文学态度

65 第三节 作为“著作同业公会”的文学研究会及其与创造社之间的论争

70 第四节 “著作工会”心态与文学研究会强烈的指导文坛意识

73 第五节 “著作工会”指导文坛的需要与文学研究会的“主义”标榜

81 **第三章 “大人类主义”意识与文学研究会的世界文学视野**

82 第一节 “大人类主义”意识与文学研究会世界文学观念的成熟

93 第二节 以“人类”的胸怀行兼容包并的世界主义文学译介

98 第三节 以“人类”的名义将中国旧文学整理纳入“世界文学”范围

109 **第四章 “大人类主义”与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

112 第一节 “大人类主义”与民族国家文学话语向“人的文学”话语的转型

125 第二节 “大人类主义”与文学研究会“为人生”艺术观的底色
131 第三节 “大人类主义”与文学研究会“为人生”文学的“新理想主义”色彩
153 第四节 “大人类主义”与文学研究会“为人生”文学的观念化倾向

174 **第五章 “互助主义”与文学研究会“爱”与“美”的文学**
175 第一节 由“竞争”到“互助”：“五四”社会进化论世界观的转型
201 第二节 “互助主义”与文学研究会的泰戈尔“热”
221 第三节 文学研究会“爱”与“美”创作中的“互助主义”色彩

240 **第六章 “泛劳动主义”与文学研究会创作中的人物塑造**
241 第一节 “泛劳动主义”与文学研究会创作中美化下层人物的塑造模式
245 第二节 理想化的下层人物背后闪耀的是“泛劳动主义”远祖卢梭的光芒
249 第三节 “泛劳动主义”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了转向阶级文学后的文学研究会

255 **结语**
260 **参考文献**
281 **后记**

绪 论

文学研究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公认的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纯文学社团。如果缺少了文学研究会的存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格局和基本面貌必定是另一番景象。从20世纪30年代起，文学研究会就成了中国新文学史论著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章节。1931年出版的谭正璧的《中国文学史大纲》，将“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并列而论①，1932年出版的胡云翼的《新著中国文学史》也对文学研究会的文学倾向和文学创作有专门的论述②。1935年10月，《中国新文学大系》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茅盾所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即以文学研究会作家为主体。茅盾为此写了一篇长达近3万字的《导言》，对文学研究会成立的背景、社团情形以及理论、创作倾向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1939年出版的李何林先生编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以较大的篇幅论述了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写实主义”倾向③，其

① 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光明书局，1931年3月版，第153—155页。

② 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北新书局，1932年4月版，第291—303页。

③ 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生活书店（重庆），1939年9月版，第20—25、76—95页。

贡献和影响是相当大的，大体上奠定了文学研究会出现在其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著中的基调。其后出版的大量的中国新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论著，都大体上沿用了这一观点。

除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的论述以外，有许多学者都曾经为文学研究会的专题研究付出过大量的劳动和心血，也取得了相当不俗的成果：贾植芳先生等主编的《文学研究会资料》（上、中、下三册），收集了许多容易散逸的资料，为文学研究会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田仲济先生对于文学研究会社团和文学研究会作家的研究，苏兴良、朱德发先生对于文学研究会社团的研究，龙泉明对于文学研究会诗歌创作的研究，都对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现实主义”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探讨。杨洪承先生在此基础上还做了更为深入的工作，将文学研究会社团的“群体文化”纳入了研究范围，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文学研究会偏向于“现实主义”的内在机理。近年来，黄志雄出版了《文学研究会诗歌论》（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 年版），对文学研究会的诗歌创作进行了系统性的专题研究，这对于我们全面了解文学研究会的诗歌创作成就有相当大的帮助。石曙萍的《知识分子的岗位与追求：文学研究会研究》（陈思和、丁帆主编，东方出版中心，2006 年版），是近年来所见的对于文学研究会最为扎实的研究专著，该著作将研究视点上溯到 1919 年创办的《新社会》旬刊和 1920 年创办的《人道》月刊，以论述文学研究会的刊物为重点，从刊物的发展过程、人事关系、编辑风格、与社团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对《小说月报》、《文学周报》、《文学旬刊》、《诗》进行了全面论述。同时还对文学研究会的创作与翻译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董丽敏的《想象的现代性：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虽然不是对于文学研究会的社团研究，但是，它对文学研究会的代用刊——《小说月报》进行了系统的探讨，总结了出版机构、社团论争、编辑立场等因素之于“刊物”这一文化产品面目塑造的特殊作用，梳理了《小说月报》在译介外国文学、确立现代学术规范、塑造新文学创作范型等方面的得失，这对于文学研究会研究而言，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到目前为止，学界对于文学研究会的相关研究，主要是从文学思潮本身的角度去把握这一社团的文学倾向，如俄国人道主义（“为人生”）文学思潮、法国的自然主义文学思潮，乃至“新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以及写实主义手法、现代派创作技法的应用，等等。诚然，这些因素都是影响文学研究会的文学倡导和文学创作的重要方面，但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继承者，面对黑暗而破败的中国社会现实，强烈的社会改造使命意识又导致文学研究会的关注目光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本身，它对于“五四”期间流行于国内外的各种社会思潮相当敏感，并且强烈要求将各种社会思潮与文学结合起来进行推广，从而促进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改造。后来成为了文学研究会的核心骨干和理论旗手的茅盾，曾经在 1920 年作出过这样的代表性发言：“文学家的责任”，就是要“用文艺来鼓吹新思想”，“自来一种新思想的发生，一定要靠文学家作先锋队”①。这种以文学作为“新思想”武器的呼声，其实是“五四”新文学界的普遍心声。从文化革新、思想革新的角度来对新文学提要求，是《新青年》最为基本

① 佩韦（沈雁冰）：《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东方杂志》17 卷 1 号，1920 年 1 月 10 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思路，作为《新青年》思想最直接继承者的文学研究会，一直践行的都是这种文学思路。

那么，被融合进了文学研究会的理论倡导和文学创作的社会思潮有哪些呢？难道仅仅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五四”时期的人道主义、个性主义思潮吗？通过查阅大量的资料我们发现，在庞杂的“五四”社会思潮中，为文学研究会所关注并且深受其影响的远不止这些。文学研究会的前身，来自一个叫做“联合改造”的团体①，而这一团体，是由人道社（郑振铎、许地山、耿济之、瞿世英、瞿秋白等）、曙光社（王统照等）、少年中国学会（沈泽民、张闻天等）、青年互助团（庐隐等）组合而成的，不仅文学研究会的骨干主要来自这些团体，而且文学研究会半数以上会员均来自这几个团体或者与之有密切关系，这些团体所办的刊物《新社会》（后改名《人道》）、《少年中国》、《曙光》等，都是“五四”时期引进和宣传各种社会思潮的著名刊物。考察这些刊物及日后成为了文学研究会的骨干或重要成员当年所发表的文章，我们发现，他们当时所宣传的社会思潮虽然相当庞杂，但概括起来，除我们所熟知的人道主义、个性主义思潮之外，尚有为研究界重视不够的在当时影响巨大的以下三大思潮：（1）“互助进化”思潮，（2）“世界大同”的“大人类主义”思潮，（3）“泛劳动主义”思潮。文学研究会因为其骨干成员及思想传承主要来自于这几个团体，因此，这三大思潮普遍融入到了文学研究会的文学倡导和文学创作之中，从而对文学研究会的文学倾向造成了重大影响。

---

① 参见笔者《“改造联合”与文学研究会的文学倾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 年第 3 期。

就目前的研究情况看，我们对于“五四”社会思潮对文学研究会的文学倡导和文学创作所造成的复杂影响，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从而导致了文学研究会研究中的诸多重大问题仍然无法解决。

（一）中国现代文学史论著普遍从俄国的人道主义文学的影响来把握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文学倾向，但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马上就会遇到文学研究会研究中长期以来一直语焉不详的如下问题：同样是接受了俄国人道主义文学的影响，为什么文学研究会核心作家群的代表作品与鲁迅的作品在色调上却会如此地大相径庭？鲁迅的作品以国民性批判为基本内核，下笔冷峻、笔调阴沉、笔锋犀利，很少看到其作品中人物身上带有“爱”与“美”的理想亮光，《一件小事》中的车夫，几乎是鲁迅小说中绝无仅有的例外；而文学研究会核心作家群笔下的人性则普遍带有许多理想色彩，作品中的人物常常是“爱”与“美”的人性体现者，冰心的《超人》中，禄儿的爱轻易就感化了信仰尼采超人哲学、以爱弱者为耻的冷冰冰的何彬；王统照的《微笑》中，女犯人的一个善意微笑，居然使小偷阿根翻然悔悟，出狱后成了一个有知识的工人。同是“为人生”、“人道主义”，为何鲁迅不从事文学研究会那种“爱”与“美”的文学创作，而文学研究会却热衷于此道，并且“爱”与“美”的文学还成为了文学研究会社团的主要特色？可见，文学研究会“爱”与“美”的文学，除了来自于俄国的“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之外，必定还有别的渊源。

这个问题，单纯从文学思潮角度去研究，是无法得到圆满的解释的。因为文学研究会所接受的“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绝不仅仅来自于俄国的“人道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它还与文学研究会所

接受的“互助主义”这一社会思潮有密切的关系。通过资料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在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前，作为文学研究会重要来源的“新社会”（人道社）、曙光社、少年中国社、觉悟社，都曾经在其刊物《新社会》、《人道》、《曙光》、《少年中国》、《民国日报·觉悟》上，大量刊文介绍“互助主义”的社会理论。庐隐在《互助》、《进化》杂志上，冰心在《晨报》上，也都曾撰文宣扬“互助主义”的学说和理论。

“进化论”的进入中国并广为国人所接受，始于严复的《天演论》。相当富有意味的是，严复在译介进化论时，不去译达尔文，却选译了赫胥黎。而赫氏的理论，是一种“社会理论”，而不是达尔文意义上的那种“自然科学”理论。诸多研究都指出，严复的用意，并不在于引进一种自然科学理论，而在于用“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竞争”规律来激起国人的警醒和自强，从而达到保国保种的目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人，当年都曾经受到过《天演论》的影响。但在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前的一段时期，《天演论》所宣扬的那种“竞争”学说，受到了极大的责疑。“一战”在协约国一方取得胜利之后，国外普遍流行这样一种理论，即认为“一战”的恶果，是“竞争—进化”学说所造成的祸端，而协约国的胜利，则被认为是“互助”的胜利，于是，1918 年蔡元培欧游归来带回了这一学说并四处演讲之后，“互助—进化”遂取代了国内原来流行的“竞争—进化”理论，并蔚为大潮。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受到了“五四”青年们的热捧。在这一社会思潮的影响下，1919 年到 1920 年，宣扬过“互助主义”的刊物计有《新青年》、《新潮》、《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新社会》、《人道》、《曙

光》、《批评》、《新人》、《觉悟》、《互助》、《进化》，这些刊物与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作为“互助进化论”之实践的“工读互助团”，则遍及北京、上海、武昌、南京、天津、广州、扬州等地①。即使是远在绍兴的由浙江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学生许杰等人组成的“龙山学会”，其学会的“信条”——“奋斗、互助、俭朴、实践”中，也有“互助”这一条②。可见“互助进化论”在“五四”期间的影响度之深和流行范围之广。而作为文学研究会前身的“改造联合”团体（由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于1920年8月组成），则曾经公开宣称：“本联合结合各地革新团体，本分工互助的精神，以实行社会改造。”而其目标则定为：“以今日的人类必须基于相爱互助的精神，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③

宣扬“互助”、“相爱”的“互助进化论”，是在俄国“为人生”文学之外，文学研究会所接受的“人道主义”理论的另一个源头。“互助进化”思潮与来自俄国的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在文学研究会中被融为了一体，从而让文学研究会的人道主义文学创作，带上了一种特殊的色彩。它使得文学研究会的文学创作不仅像俄国文学那样热衷于表达对于下层人民的同情，写下层民众生活的黑暗，而且还热衷于表现人与人之间、下民民众之间的相惜、“互助”。最典型的莫如冰心

---

① 张允侯等：《五四时期的社团》（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61—496页。

② 《本会信条颂》，《越铎日报》附刊《龙山》第3期（“龙山学会周年纪念号”），1922年5月28日。

③ 《少年中国》2卷5号，1920年11月15日，“附录”栏中。

的《超人》，作品中何彬由一个内心冰冷的人转变为一个热衷于帮助他人的人，其背后的思想实质，实就是“互助进化”理论对于尼采的“竞争进化”理论的胜利。在王统照的《微笑》、庐隐的《或人的悲哀》、叶圣陶的《恐怖的夜》中，都隐隐地映现出“互助”所带来的人性的亮光；而人性的冷漠，世界的冰冷，在文学研究会的代表作家笔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缺乏“互助”而造成的，如叶圣陶的《苦菜》、《阿凤》、《晓行》，王统照的《遗音》、《一墙之隔》，等等。而鲁迅虽然深受俄国的人道主义文学的影响，但是，他一直对“互助进化”的社会理论持怀疑态度，与周作人在“五四”时期热衷于参加“工读互助团”不同，鲁迅对这一运动一直采取冷眼旁观的姿态。相应地，在鲁迅笔下，我们很难看到有文学研究会所热衷于表现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助”、“相爱”、“相惜”。说到底，同样是信仰人道主义，但在此基础上，鲁迅更倾向于尼采（竞争进化论），而文学研究会却更倾向于克鲁泡特金（互助进化论）。

（二）中国现代文学史论著普遍将文学研究会所热衷的对下层人的生活的描写，归因于俄国和北欧文学中“平民主义”思想的影响。然而，只要加以对比，我们就会发现，同样是受到了俄国和北欧文学中“平民主义”思想的影响，鲁迅和文学研究会核心作家对于下层人物的塑造却有很大的不同。在鲁迅笔下，无论是下层人物中的阿Q、祥林嫂还是爱姑，都是麻木国民的代表，他们身上并没有任何道德的亮光；而在文学研究会核心作家笔下，下层人却常常成为道德优势的代表，如：阿凤（叶圣陶《阿凤》）、寡妇“伊”（《潜隐的爱》）、农民（叶圣陶《一粒种子》）、女犯人（王统照《微笑》）、惜官（许地山《商人妇》）、尚洁（许地山《缀网劳蛛》）等，他（她）们身上，

都闪现着道德亮光。这充分说明，文学研究会将道德优势赋予下层人物的做法，恐怕并不仅止于俄国和北欧文学中“平民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此之外，它应该还有更为复杂的渊源。

其实，鲁迅的《一件小事》当中的人力车夫身上，也曾闪现出强烈的道德光芒。然而，正像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鲁迅这篇颇为例外的作品，是“五四”时期“劳工神圣”思潮影响之下的产物。事实上，文学研究会文学创作中普遍将道德优势赋予下层人物的现象，同样与“劳工神圣”的思潮有关。曾经有不少的研究者认为，“劳工神圣”学说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潮影响之下的产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马克思看来，除工人因为与先进生产力相联系而具有道德优势外，农民、下层人，并不等于其天生就有道德优势。而将下层民众的道德神圣化的倾向，正好是“泛劳动主义”的理论范畴。“一战”期间，中国加盟协约国后，无力出兵参战，于是，就向协约国一方派遣了大量的劳工。“一战”以协约国一方胜利而结束后，欧游归来的蔡元培在 1918 年 11 月 16 日作了《劳工神圣》的演说，1920 年他又在第 7 卷第 6 号的《新青年》上题写了“劳工神圣”四个大字，于是，“劳工神圣”学说在国内思想界广为流传。“劳动”一词，遂成为了“五四”社会思潮中的关键词之一。“五四”时期流行的这种既有别于“平民主义”又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的“劳工神圣”思潮，在思想史研究界普遍被定义为“泛劳动主义”思潮。所谓的“泛劳动主义”社会思潮，是指把劳心、劳力，均视为劳动，并把劳动神圣化，视劳动为人生之必须，进而对下层民众、农民进行“高尚”、“纯洁”的道德指认的思潮。

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渊源的“新社会”（人道社）、曙光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